

传统符号思想进路：评《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

叶 进

书名：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

作者：祝东，等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 年

ISBN：9787030708021

DOI：10.13760/b.cnki.sam.202202022

一、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中的伦理思想

就中国传统符号思想与伦理思想的关系而言，在符号表意行为的整个过程中伦理精神贯穿始终（王小英，祝东，2018，p.11）。从内容和结构上看，该书从两个方面来展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首先，“整体上以时间脉络为序”（祝东，等，2021，绪论 p.10）。作者曾明确表示：“我们可以这样说，把握住了先秦诸子伦理学思想，特别是儒、墨、道、法四家的伦理学思想，就基本上把握住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顺流而下，两汉阴阳五行之学、唐宋佛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则是支流，皆受到先秦伦理思想的影响。”（绪论 p.4）其次，是各主题之间的内部学理逻辑。作者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以中国符号学思想传统的元伦理为中心，从自然伦理、宗教伦理、社会伦理诸维度进行合围，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思想史传统”（绪论 p.10）。沿着这条思路，将《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称为“中国古代伦理符号思想史论”亦有合理之处。

对于先秦时期的先哲们而言，道德伦理问题不仅是知识问题，更是信仰问题和道德实践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符号学思想本身就是伦理符号学的进路（绪论 p.5）。在这里，作者已经表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符

号思想之间的关系。所谓“伦理”，《礼记·乐记》有言：“乐者，通伦理者也。”（李学勤，1999，p. 1081）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伦，辈也”（段玉裁，2013，p. 376），可引申为辈分、顺序等义；理，即治玉，段注为“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p. 15），可引申为道理、规则之义。由此，“伦理”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意义规则（祝东，等，2021，绪论 p. 3）。作者之所以将所论十个主题划分为四种伦理观，也与其自身所记述和表征的内容、对象，以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有关。

先秦诸子们将“阴阳”“气”等作为解释世界的形成及其变化的观点，儒家自不例外，像数学本身便是以阴阳五行说来统御卦象、卦变的一套繁复的抽象数理结构（姚彬彬，2020），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也是如此，以“阴”与“阳”解释“刚柔”“乾坤”“贵贱”“尊卑”等，由此“阴”“阳”成了理解世界、自然起始的元语言。《周易》对自然、世界的解释与表征也受到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在“易学符号思想及其伦理意义”一章中，作者从文化语境、时空语境以及伦理语境三个层面来探讨《周易》及易学中的符号模塑问题及其对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具体到伦理语境上，《周易》及易学中的伦理思想表现为儒家道德伦理对自然世界全面深入的解释，以及儒家道德伦理观对吉凶问题的阐释（于化龙，2019，p. 230）。

在“堪舆的符号及其生态伦理意义”一章，作者梳理中国传统堪舆思想，认为传统堪舆思想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价值，而且对堪舆符号表意的解释还需要符合儒家的伦理标准（p. 200）。作者认为，传统堪舆思想对儒家道德伦理标准的遵守体现在堪舆理论和堪舆实践两个层面，并以堪舆思想中的“龙”为例说明儒家的家庭伦理是如何影响堪舆符号表意解释的。堪舆思想、堪舆活动是一门综合式的学问，其中不仅包括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还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美学、心理、地理、生态、景观诸方面的丰富内涵，也包含大量关于人如何顺应自然的论述（王其享，1998，p. 1）。丰富、庞大的堪舆思想内涵，完备的堪舆符号体系、表意机制及意义解读机制，满足了人们通过堪舆思想、堪舆活动“选择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有益的地理环境”（p. 187）的现实需要，也从多个层面来表述、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意义交往活动。

除了上述两个主题外，书中其余八个主题，也与传统伦理思想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思想的承继关系来看，儒家符号思想、道家符号思想受到易学符号思想的启发，墨家思想的形成与创立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符号思想、伦理思想的承继来看，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也在中国传统符号思想体系的建

构中悄然进入研究视野。

从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方面来看,本书一方面按时间先后顺序,以线性结构完成了现代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观照下的中国古代符号思想传统梳理与中国传统符号思想体系建构;另一方面在内在学理逻辑上完成了对与符号学关系紧密的传统伦理思想的展示。可以说,本书在建构中国符号思想体系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传统的推进做了有益尝试。

二、伦理符号学与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的推进

祝东教授认为:“伦理符号学并非以伦理为研究对象,而是符号学研究的一种视域,认为人类的符号活动与生命活动同步,因此要求符号学回到人类符号活动的价值论维度,人类作为唯一能够对符号活动进行反思的动物,必须担负起对生命的责任。”(祝东,王小英,2017,p.67)作为一种新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伦理符号学强调在全球视野下整体把握和关怀所有生命。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先秦时期的哲学家们就已经围绕生命的意义、人际交往的伦理秩序、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探讨,并形成了一大批伦理思想文本。这些文本既为发掘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思想提供了基本条件,也为解决当下新媒体技术、新媒体文化所带来的符号危机提供了另一种进路。

当下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成果可以看作对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的积极探讨:李幼蒸对传统仁学、儒学的解释学研究与中国伦理思想结构研究,陈来对春秋时期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的研究,祝东对老子伦理符号的研究等都可归入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研究体系。先哲们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思考中包含丰富的生命关怀和道德评判,也包含丰富的伦理符号阐释。该书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关注“将先秦伦理思想的研究置于符号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更加注重生命关怀,期望通过对全球性的交流、生产的反思,从符号活动和符号伦理来凸显人作为‘使用符号的动物’和‘伦理符号的动物’之间的关联”(王小英,祝东,2018,p.8)。

作为一本较为系统地梳理中国传统符号思想,建构中国传统符号学体系的专著,本书也推进了对中国传统伦理符号思想的研究。就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的体系建构与进路而言,作者在绪论部分推进中国传统符号思想史论建构时,针对各个主题的分类、主题之间的内在学理脉络给予了启发性的提示和指引。这里可就中国传统符号学体系的建构对中国传统伦理符号学总体框

架的启示略加展开以供交流。

在总体框架建构方面，该书建构的中国传统符号学体系以“易学”“河图洛书”为元符号，分为自然世界符号、宗教信仰符号、社会伦理符号诸维度。诚如祝东教授所言，伦理符号学旨在让符号学回归人类符号活动的价值论维度，以符号活动反思承担起对生命的责任，而这种责任体现在传统社会中，便是先哲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对符号表意活动所采取的伦理道德精神。具体而言，即古代先哲在处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符号表意活动时对“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平等对话、反人类主体意识过度膨胀等伦理价值的尊崇；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关系的符号表意活动时所秉持的道德伦理，以及在符号表意过程之中、之后对符号表意行为的道德评判和意义阐释（王小英，祝东，2018，p. 11）。

在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体系框架的启发之下，以“修仙”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修行活动及其文本应当得到中国传统伦理符号思想梳理与研究的重视。首先，以“修仙”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修行活动的基础是特定的宇宙观、生理学假设的表意活动；其次，中国古代修行活动形成符号、文本、文化、符号圈，既是符号过程，也是社会意识形态过程；最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仙”是经由群体的社会接受和集体记忆形成的（康儒博，2019，p. 23）。这三个方面，都充满了符号活动与表意行为。道德伦理也始终贯穿其中。在宇宙观、生理学假设方面，修道者或者说“仙”具有不食用主流食物而代之以草药、矿物、丹药、“霞”、“露”等的特殊能力；在居住环境上，主动离开家庭、远离人群、独居山野，归入人迹罕至的自然，以避免与普通人发生过多接触。这实际上对应的是元伦理、自然伦理。在仙传的形成方面，刻在石碑上的故事可以“增强这个地方（立碑之地）的特权，同时提升立碑者的声名”（p. 217）。这样，立碑的过程实际上不仅将某个人物与这个地方关联起来，同时也将关于碑中所刻主人公的记忆与立碑者的记忆联系起来（pp. 217 - 218）。这实际上对应的是宗教伦理。除了容纳元伦理、自然伦理、宗教伦理，中国古代的修行活动也包括社会伦理，“仙”不仅是经由群体的社会接受和集体记忆形成的，还以各种形式参与普通人的生活，并与之发生关系：修仙前期离开家庭，摆脱血缘关系；修行中避免与普通人发生过多接触，同时接受对是否具备修行资质的考察，接受考验，遵从一定的戒律等；修行有成以后，通过预言、治病、管理神魔等方式给普通人提供服务以获取声名。这是社会伦理的直接表现。不同于西方传道者、牧师，中国古代“仙”的修行活动不仅强调天人合一性，反对人类主体意识的过度膨胀，同

时也以伦理思想来维护、规约人的符号表意行为，并以伦理精神来阐释、评判人的符号表意行为。

三、秦汉时期对先秦符号思想的继承及发展特点简述

书中多次明确提及两汉对先秦符号思想的承继。在“礼法嬗变与形名符号思想的发展”一章中，作者提及“先秦学者从政治论与语言逻辑两条线展开对名实问题的思辨……逐渐破除了名的神秘，到了黄老之学这里，出现形名转关，形名之学应用到社会治理之中，形名学成为融合儒家、道家、法家、名家等诸家学派学术思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符号学模式”（p. 97）。“河图洛书及其符号思想研究”一章比较了先秦和两汉时期河图洛书的继承与发展，“虽然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祥瑞之意尚存，但这已不再是唯一的意义，思维活跃的汉代学者在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解释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念”（p. 113）。秦汉（尤其是两汉）对先秦符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符号解释项的扩展与消解。在符号学视域下，对符号的不同解释之间并无高低好坏之分。秦汉时期对先秦符号思想中的符号解释项的扩展主要表现为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符号解释范围的扩大。在先秦时期，河图洛书作为祥瑞之征兆而存在。如《论语·子罕》有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李学勤，1999，p. 115）而秦汉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及思想环境，河图洛书不仅是祥瑞的征兆，也发展为一种新的符号表意系统，逐渐系统化、体系化，形成讖纬式的河图洛书。讖纬式的河图洛书一方面假托河图洛书之名创造了一大批神话故事、讖纬故事，另一方面附会出一大批讖纬文本。先秦时期的“五行”指的是“五种材料的并称，并不具备成为符号的条件”（pp. 141 - 142）。《尚书·洪范》有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p. 301）战国时期，邹衍据此发展了“五德始终说”，此时五行被解释为“五种天然的力量”（冯友兰，2011，p. 96），开始了符号化进程。而在两汉时期，五行不仅与《易》结合，还吸收了阴阳思想、灾异思想、八卦思想等内容，彻底完成了符号化，其符号意义也在规范化后载入字典，固定下来，成为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吉凶、注经等方面的解释规则和依据。

符号解释项的消解表现为某些表征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符号之解释项

的纠正与取代。“五德始终说”为秦汉大一统王朝所继承，秦朝以“水”作为国家象征符号，色尚黑；西汉代秦，则用“土”作为国家象征符号，其色尚黄。按照邹衍的解释，“五德始终”的依据是“五行从所不胜”，也即五行相克。而到了新莽时期，王莽以五行相生代替五行相克来解释“五德始终”的运转规律，改西汉的“土德”为“火德”。以五行相生代替五行相克，既是对“五德始终说”解释项的消解，也是对先秦符号思想中的符号解释项的消解。

其次，秦汉时期对先秦符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逐渐系统化、规范化地发展为较为完整的符号体系与意义世界的过程。不论是对易学思想、礼法形名思想、河图洛书、阴阳五行思想、堪舆思想，还是对儒道墨诸家思想，秦汉时期都在建立大一统王朝的现实需求下加以整理、归纳和发展，使之成为相对稳定的指导社会实践的符号体系。两汉时期对儒家、道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自不必说，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堪舆等思想在秦汉时期不论是在配数、配物的体系化、规范化，还是在解释范围、解释的灵活性等方面都得到完善，最终成为指导社会实践的符号体系。两汉时期的相宅术、相墓术及墓葬文化，两汉讖纬文化、祥瑞灾异思想都是如此。堪舆是先民选择宜居环境和墓地环境的经验总结。从时间上看，堪舆思想萌芽于先秦时期，并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吉凶判断体系、分类标准以及习俗禁忌等内容。其将陆地划分为山、埠、丘、原、陵、岗等，将水域划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诗经·大雅·公刘》描写周人先祖选择祖地时有言：“……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冈，乃覲于京。”《周礼·地官·司徒》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命宅而卸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战国以后，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堪舆思想及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丰富，“土宜”之中开始融入“天文”思想。而到了秦汉时期，堪舆理论在融合“天道”与“地道”的同时，又引入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到汉代，不仅出现了“堪舆”一词，而且相墓、丧葬观念和丧葬文化迅速发展，形成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堪舆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堪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理论化、体系化和系统化。

最后，秦汉时期对先秦符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带有极强的融合性和神秘主义倾向。先秦时期诸学派思想观念存在相互交流、学习甚至吸收的情况，但是各家之间还是存在明显区别的。而到了秦汉时期，诸家却呈现出明显的融合性。如秦汉时期的堪舆思想在先秦堪舆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易学、阴阳、

五行、气、天人关系等；五行思想在符号化的基础上融合了灾异、阴阳、《易经》、八卦等思想。多种思想融合以适应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在秦汉时期是一种普遍现象，秦汉时期政治上的大一统必然要求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秦汉思想对先秦思想的继承发展还带有神秘主义的烙印。在两汉时期的谶纬文化、谶纬思想中，孔子不仅出生方式、容貌异于常人，还带有为汉家作制的特殊使命，以至于被尊为“圣”。对于这样的融合性与神秘主义，顾颉刚先生在《汉代学术史略》有过表述：“是把所有学问，所有的神话都归纳到《六经》的旗帜之下，使得孔子真成个教主，《六经》真成个天书，借此维持皇帝的位子。”（2005，p. 118）

在秦汉与先秦思想的延续性问题上，书中有这样的表述：“汉代是河图洛书嬗变的第一次高峰，也是河图洛书解释项发挥余地较为全面的一次。虽然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祥瑞之意尚存，但这已不再是唯一的意义……”（pp. 141 - 142）。伴随着政治上的大一统，在寻求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与解释时，如何认识和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摆在秦汉时期的人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卫聚贤围绕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提出了依次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是人们对自然界的观察；第二阶段是对自然现象的神话解释，认为自然是由神灵主宰的；第三阶段是对自然现象形成一些推论，包括一些哲学上的解释；第四阶段是人类对自然界的逐渐臣服，是将来式的（马昌仪，2013，pp. 304 - 307）。依此反观，秦汉时期的思想从最初阶段的自然观察到神话解释都有对先秦思想的继承，既包含了最原始的自然感知、神话传说的思维结构，也有处于第三阶段的推论。这些特点主要集中在秦汉时期的人们对社会秩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表达上。秦汉时期不仅仅将先秦思想的自然感知、神话思维、推论以相互融合的方式赋予阴阳哲学、五行哲学、天人感应哲学等色彩，也呈现出宗法伦理、宗教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等价值。

作为第一本较为系统地梳理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的专著，《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或许会因为章节设置中对伦理的过分强调，以及在序言、正文中不少地方对中国传统符号学、伦理观、伦理思想的融合叙述，而给读者带来“偏题”的错觉。然而，通读全书之后，再沿着作者的章节设置、内在学术逻辑结构思考，便会有豁然开朗之感，才明白中国传统符号思想不仅仅是一套意义表达机制，还在意义表达过程中凝结着浓厚的伦理约束和道德规范意味。《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不仅完成了对中国古代符号学体系的初步建构，更是基于中国传统符号思想与传统伦理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为中国

传统伦理符号思想的现代学术转化、现代进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引用文献:

- 段玉裁 (2013). 说文解字注. 北京: 中华书局.
- 冯友兰 (2011). 中国哲学史 (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顾颉刚 (2005). 汉代学术史略.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康儒博 (2021). 修仙: 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 (顾漩,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学勤 (主编) (1999).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 (标点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昌仪 (2013). 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 (上册).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 王其享 (主编) (1998). 风水理论研究.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 王小英, 祝东 (2018). 全球化语境下的伦理符号学研究进路. 中国比较文学, 3, 2-16.
- 姚彬彬 (2020). 从“以经解经”到“以《易》解经”——清代以来儒学经典诠释中的一条哲学性进路.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49-159.
- 于化龙 (2019). 中国传统符号思想的研究典范: 评苏智《〈周易〉的符号学研究》.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19.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29-233.
- 祝东, 王小英 (2017). 中国符号学传统与社会伦理重建——中国古代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的进路. 山东社会科学, 8, 67-72.
- 祝东, 等 (2021). 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叶进,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符号学遗产。

Author:

Ye Jin, Ph. 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field is Chinese traditional semiotics.

Email: 2385752006@qq.com